

黄家坝，我那如烟的人和事

◎ 刘六佑



离开故乡黃家坝 30 年，我已近知天命的年龄了。

在异地他乡，因工作、生活等琐事缠绕得睡不着觉时，你知道缓解失眠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吗？

就是截取一段记忆，关于故乡黃家坝的记忆。有时是截取某个人、有时是某件事，有时是某座山、某个坡、某棵树甚至是故乡的某个角落，睡不着的时候，就让思绪去打捞、去重现、去回味。这时他们就会化成一串音符，编织出或优美柔和或略带伤感的乐曲，让我抛却烦恼、忧愁在异乡无数个深夜得以安然入梦。

今年春节带着爱人孩子回故乡，早上散步到一条竹林边的小溪，我指着那块捣衣服的石板，指着那面山坡对爱人说，我在几千里外的他乡睡不着觉的时候，就经常想念这清澈的小溪、干净的石板、翠绿的山坡。

截取关于故乡的记忆多了，有些人和事或者场景，就会时不时地在脑海里呈现。于是，他们就会张着嘴同我说话，就会挥手向我打招呼，甚至直着眼注视着我。

想得越多，思念越浓。多了，浓了，就得有所交代，否则故乡会不高兴，他们就会来找我说理。为了给自己一份交代，给我巴山蜀水的故乡黃家坝一次掏心，就有了下面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场景……

一、朱长福，空落落的一生

朱长福，壮实黝黑，抬头纹重，憨厚，爱笑，认死理，啥时候见到都乐呵呵的模样，他比我年长十几岁。

我十岁多一点，香港电视剧《霍元甲》《陈真》系列正风靡。黄家坝村没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我们要翻越一座山到隔壁村才能看上电视，有电视的那户人家就在山脚下不远。朱长福住我家对面的竹林下，每到周六傍晚，他都会扯着嗓门在竹林下喊：“看电视的，集合出发了”。我们当然经不住这一声喊了，有时我们刚同父母从庄稼地里回来，有时正在灯下写作业，只要他这一声喊，黄家坝上半村如我们般大的孩子都会不约而同地奔朱长福的喊声而去。

打着手电或者火把翻山，常惹得半个村子的狗都会叫起来。连跑带颠赶到有电视机的那户人家时，早有一大群人把一台 14 寸的黑白电视机围的水泄不通了。电视是不能白看的，当电视剧放到精彩处，那家人就会挨个地收钱，少则五分，多则一毛钱，说是电视费电，全当是收点电费钱。

我们这些泥孩子平时好不容易积攒几分钱，就为了等着周末去看一次电视。当人家走到面前来收钱时，我们往往连五分钱或者一毛钱都凑不够，这时朱长福就会好言好语地同那家人讲，这是黄家坝谁家的孩子，这次没带够，下次来再补上吧。有时朱长福说尽好话也不行时，他就会悄悄掏出几分钱来帮我们凑。

看完电视回来，一通火把手电加上高声的剧情讨论，会把沉寂在黑夜里的整个大山都唤醒。朱长福比我们大，说话比我们有权威，往往对剧情的争执意见不一致时，他就会出来发表意见，这时我们都会觉得他说得在理。

前不久，我在央视的怀旧剧场里再次看到 83 年版的电视剧《陈真》时，那首主题歌一想起，当年翻山越岭看电视的情景就如抹不去的电影镜头般一幕幕在眼前呈现，还有那个壮实黝黑、抬头纹重、憨厚、爱笑、认死理的朱长福。

后来，朱长福学了石匠，我还在读小学时，他娶了离黄家坝较远的一个村的女人做老婆，那女的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得了，个子不高，瘦瘦的，说话嗓门大，是很泼辣的那一类。或许因为朱长福憨，又爱认死理，就被她看不起，夫妻俩就经常吵架。

她生下一个女孩没两年，就喝农药死了。死的时候，她娘家来了不少人，

说是要讨回公道，朱长福和年老的母亲相依为命，也没有什么公道可讨，这事儿也就作罢。

朱长福靠打石头养着女儿和母亲。那个小女孩长得蛮可爱，两根小辫儿，嘴甜甜的。可惜的是，没过几年，女孩儿蹲厕所时，砌猪圈的石头突然倒下，女孩儿直接被石头压在茅坑里淹死了。那次朱长福哭得跟孩子似的在地上滚来滚去，任他年迈的母亲怎么劝都无济于事。

后来，我上初中、上高中以及离家当兵，就很少见到朱长福了。有一年我回家休假，在村上的堰塘边远远地看见过他，他裹着一件露着棉絮的长大衣，站在田埂上，枯瘦得像一根破败的木桩，额头一圈一圈的皱纹深得像镶在了肉里。我确定认出来了他，不知道他是否认出了我。

女儿夭折后，朱长福始终未娶，就一直和母亲一起生活。

没过几年，听村上的人说，他患了脑瘤，精神错乱，成了精神病人。他八十多岁的母亲要经常没黑没白地看着他才行。

再后来，据说他脑瘤疼痛发作，在一年隆冬死在了通往庄稼地的一条小路上，村里人找了几天，找到时整个人都冻成了冰，村上简单地安葬了他。这就是那个当年壮实黝黑、抬头纹重、憨厚、爱笑、认死理，经常带着我们翻山越岭看电视剧的朱长福，五十多岁空落落的一生。

再读首诗吧：

那么多我知道的人都走了

身后有鞭子在赶，还是前面有诱惑在唤

那么多我知道的人都走了

走了，一缕青烟飘过就什么都没了

想截取一段音容留住一点片段

却被时间的大剪剪得七零八落

想想也释然

一粒尘埃，一根小草，一只蚂蚁

本身就是匆匆的过客

雨一下，风一吹

谁记得谁，曾经来过

二、郑全兴，无知演绎的另类《盲山》

他就是赖着不走，而且会专门挑我们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的时候来要钱。

多年后，只要一想起这件事，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心机的人，尽管那时我们都还很小，我上小学二三年级，他大不了我几岁，顶多也就十二三岁，因家里兄妹多，他小学没毕业就不再上学了。

说是来要钱，其实是来让我父母赔钱的。赔什么钱？赔他连环画的钱。

那时候，一本连环画可是我们绝美的精神食粮，能借到一本连环画看，简直如获至宝。借来后，通常会自己先躲在房檐下匆匆看完，再给姐姐或者弟弟看。那些给我童年带来无限欢乐的连环画，记忆里仍是黑白色皱巴巴的模样。深刻得直到现在我也能随口说出它们的名字，如：《大刀王五》《两个小八路》《洪湖赤卫队》《小兵张嘎》《穆桂英挂帅》等等。

自己从同学那里好说歹说借来一本连环画，姐弟几人都看完后，常常又会借给别人看，就这样，一本连环画总会借来借去传阅好多人。说话算话的小伙伴，会在规定期限内准时把连环画还回来，有的则要催促好几次才能拿回来。

那一次，我从郑全兴手里借到一本连环画，自己看完后又借给了别的同学，那位同学看完后又借给了他邻居，他邻居好像又借给了别人，所以到了还书的日子，我怎么也还不上了。郑全兴先是宽限了我几天，期限到后，我仍还不上，于是就要让我赔。

因为他也是借别人的，别人也在催他，他还不上，就使劲儿催我。赔！我拿什么赔啊？连环画找不回来，赔钱，我自己也没有。于是，他就只好找上门来，向我们父母要钱。

刚来要钱，父母不搭理他，说你们小孩子之间的事情，大人不管，让我们自己慢慢想法去要回连环画。时间长了，连环画还是要不回来，郑全兴只好第二次、第三次上门来向父母索赔。

那时候，我觉得他的脸皮特别厚，有时我父母不在家，他就在院子旁边坐着不走，直到我们父母回来骂我一顿后，他才走。这次没拿到钱，他下次还会来，来，他就会专门挑我们吃饭的时候。父母确实烦了，就只好照价赔了他，我记得那本连环画当时值一毛二分钱。

他嘴很甜，会来事，个不高，肩宽，蛮壮实，我们虽然同村不同队，但



隔得也不远。因为我们喜欢一起摆龙门阵，加上他大不了我几岁，就经常来找我玩，他每次来看到我们在忙农活，比如在院子里撕玉米皮，扒黑棉桃，晒水稻等，就会主动帮把手，是那种热心肠的人。

那一年，我刚刚学会抽烟，我们没钱买，他就带着我躲在房檐后，把红苕叶卷成烟卷抽，点燃的红苕叶又苦又辣，常呛得泪流满面。还记得一次在村上一户刘姓人家那里看电视里的春节晚会，不知道他从哪里要到了一根烟，就叫着我一起躲在人群后面，点燃香烟，他抽几口再给我抽几口，直到烟屁股都烫手了，我们都还贴在嘴上使劲儿吸。

他发生那件事情时，我已经上初中了。可能因为我上学一直在乡里而不是村上的小学，加上慢慢长大了的缘故，我和郑全兴已经很少来往了，即便在路上碰到也只是打个招呼说几句话而已。

记得那时正值油菜花金黄的季节，我傍晚放学回家，全村都在说郑全兴被抓起来了，是五花大绑地从家里带走的。原因是他躲在一个油菜花地里，把一个从村小学放学单独回家的小女孩强奸了。

开始我不相信郑全兴会是那样的人，会做那样的事情。但事实证明，他是跟踪了那个小女孩好些日子后才找机会做的，而且是强奸未遂。事发后，他的父母曾到处求人，到处找关系说情，但那女孩家始终不松口，就这样，那个当年未满 18 岁的郑全兴被判了 8 年徒刑。

我一直没有证实过那件事情的真相，只听说过很多种传闻，有的说郑全兴一直对那个小女孩好，经常在她上学的路上给她带好吃的东西；有的说就是郑全兴不怀好意，一直想打那个小女孩的主意；有的说，那个小女孩家就是想把郑全兴弄进去。

其实多年后我在想，在那样一个文化落后，信息闭塞的年代，小学没读完且未满 18 岁的郑全兴，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强奸，什么叫未遂，什么叫一厢情愿，什么叫法律。只是因为喜欢或者暗恋那个小女孩，于是就那样做了。就如电影《盲山》里那些乡亲一样愚昧，根本就不懂从人贩子手里买妻是违法，反而还想方设法帮男主角，严加看管买来的媳妇儿，以防逃跑。

郑全兴 8 年刑满释放后，在黄家坝村呆不下去，就到处打工，四处漂泊，随后父母相继去世，兄妹也各奔东西。他年纪大了，就从四川甘孜州少数民族偏远地区娶了一个带三个孩子的女人。



他竹林下的老屋塌了后，又在离村小学旧址不远的地方，用打工挣来的钱买了几间房子，算是有了一个家。

我休假回故乡，陪父亲遛弯，父亲在远处指着那几间屋子对我说“那儿，就是郑全兴现在的家”。我驻足了一会儿，看见那几间旧屋子围成的院里，鸡鸭鹅正叫得欢，房顶上正袅绕着一缕缕炊烟。

我回想着那个当年借给我连环画，经常一起摆龙门阵，多次帮我们家搭把手干农活，好几次找我父母赔连环画的钱，常用红苕叶卷成烟卷，你一口我一口抽的郑全兴，此刻，我在心里默默地、真挚地祝你，有一个安顺的晚年。

再读首诗吧：

那些年，真的好青涩

一本连环画，一把红苕叶，几次龙门阵

就是欢乐的世界

喜欢了，就不顾一切

刮风了，下雨了，惊雷响了

世界狰狞得把欢乐都吞灭

柔弱的肩，扛不起啊

脚一滑，坠入悬崖

那是因为青涩，付出的代价

三、黄有明，真的想活着

黄有明痛得实在受不了。

坐也不是，躺也不是，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只好让自己的哥哥扶着，在院子里慢慢走。

街坊四邻该去探望的都去了，有的拿一筐鸡蛋加两把挂面，有的拿点钱，在农村探望病人多数都是这样。去看望过的人讲，他已经瘦得皮包骨了，头发已脱完，眼睛深陷，连说话都要大喘气。

他是在上海一家油漆厂打工，患了重病被几个老乡凑钱送回家的，回来去医院一查，已经是肺癌晚期。

黄有明，应该大我十多岁，他的哥哥认我父亲为干爹，所以我们就有了点沾亲带故的关系。他们家与我家离得不远，在我家对面山坡下的竹林里，

据说是在我家以前老房子的屋基边上盖的房。

他排行老六，我叫他六哥，我小他很多，他就经常逗我，还经常让我去他家吃饭，我现在还记得他家堂屋的土墙上贴过一幅画，碧绿的草原上有条弯曲的小河，几匹马在吃草，一位穿着蒙古族服装的姑娘在弯腰插秧。多年后，我都还记得在他家围着八仙桌端着一个大瓷缸，边吃面条边望着那幅画的情景。

他长得瘦个子高，嘴很会说，也圆滑，是黄家坝村上首批高中生，是比较有思想的那种人，我曾经在他住的房间里看到过很多杂志，后来我上学了，回忆起那些杂志觉得特别像《半月谈》《大众电影》一类。听父亲说，他们学校寝室丢了东西，因为同学怀疑是他拿的，所以高中没读完他就回家了。

关于他和我家那辆永久牌自行车的事不得不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做赤脚医生的父亲，托了好几个朋友才从县城买了辆自行车，打算自己学会后方便骑车到县城采购药。

好多个有月光的晚上忙完农活，我都在生产队的场院里陪父亲练自行车。因为父亲年龄大，加上练车时又摔了几次，最后就彻底放弃了。父亲就把自行车拆散擦拭干净装在纸箱里放了起来，说是等我们稍大一点给我们用。

黄有明知道了我们家自行车闲置的事情后，就多次上门三番五次地找父亲，请求把自行车先借给他用，说自己想做水果生意，还说等我们姐弟几人长大后，再还我们一辆新车。刚开始父亲不答应，那些年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可真是稀罕之物，价钱昂贵不说，就是有钱还要通过各种关系才可以买到。

在他多次甜言蜜语软磨硬泡后，父亲还是把自行车借给了他。很多年后，我们长大了，父亲花六十元钱从邻居那里买了个二手自行车给我们学，他都一直不提还自行车的事。隔了二十多年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他举家从云南搬回黄家坝村后，他才上门提及还自行车，听父亲说，他说了很多对不住的话，最后象征性地赔了我家一点儿钱。

我上小学不久，国家就开始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他征得村上同意，就和几位年轻人在黄家坝村靠近东风河的公路边合伙挖了两孔窑，又买来制砖机等设备，建起了砖瓦厂，还从村上招了不少人。砖瓦厂刚开始很红火，每天机器轰鸣人来人往，人人都管他叫厂长。可惜不到一年的时间，因为烧出的砖质量有问题，砖瓦厂就慢慢倒闭了，倒闭后的两孔砖窑像两张张开的

含着委屈的大嘴，满是荒草地闲置了多年。

后来，他就去了云南德宏州，究竟去做了些啥，村上人都不知道，有的说是去倒腾药材，有的说是去贩卖木头。他在云南娶了老婆，也在那里安了家，有了一儿一女。

1999年我回故乡，想把自己在异地的结婚录像带放给老家的人看，我还去他老房子那边向他借过放像机，他对我说那是他开录像厅时留下的机器。那时，他已经打算同妻儿一起回四川来，说在云南自己始终是外地人，加上在云南已经不好混了，迟早都要回来的。

他全家从云南搬回来时，儿女都已经很大了，他在村上那口老水井旁边的空地上建了新房，就算在黄家坝安了家。一对儿女学习都不好，女儿辍学后，去东莞学坏了，儿子偷东西被抓住过好几次，五十多岁的他又带着媳妇儿去上海一家油漆厂打工，后来就患上了重病。

他查出是肺癌晚期时，曾到处借钱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最后因付不起药费，就和媳妇儿回到了黄家坝。回来就到处找偏方治疗，他枯瘦的云南媳妇儿每天拎着筐拿着小铁铲，在屋檐下挖蚯蚓，在石头缝里抓蜈蚣，在后山的坟墓里逮蛇。

据说刚开始他媳妇儿还把蚯蚓、蜈蚣等这些东西烤熟了磨成粉给他兑水喝，后来，他干脆逮着什么就直接活吞。那种想活着，想健康地活着，想好好地活着的欲望，谁见了都为之动容。

他去世时正月还没过完，黄家坝周围的村子里还零星地燃放着烟花，远远望去，忽明忽暗的夜空，像极了他短暂而不安分的一生。

再读首诗吧：

他，真的想活着

已经在医院住了二十天

昂贵的费用就像一把刀割着他的心

“我们回家吧，回家找偏方治”

他咳嗽了半天才费力地同憔悴得

如庄稼杆一样的媳妇儿说

屋檐下抓蚯蚓找蜈蚣

洞穴中逮蛇，捉蝎子

起初，是让媳妇儿烤熟了自己再吃
后来，无论逮住什么他都直接吞
好像这些偏方说的虫子里
会出现神一样的东西
他在上海做了十年的油漆工
肺痛得都喘不过气了，才被老乡送回来
儿子在外偷东西进去了
女儿在东莞学坏后染了一身的病
他刚五十岁出头
他想活着，真的想活着
这是一年后，他周年的祭日里
老家的人给我讲的

四、黄贵才，我们小草一样的今生

我确实是想把黄贵才放到最后来写的，原因是我和他交往最多，他也是我在故乡黄家坝接触时间最久关系最好的伙伴儿。

自我离开故乡，我们近三十年没见过面了。期间，我曾多次回家探亲，他也经常从外地务工回家，要么我回去他不在，要么他回乡我不在，反正三十年来一直都阴差阳错地失去了见面的机会，直到 2020 年春节，我们才见上面。

那天他正在邻居家打麻将，见面，我们都很平静，并没有所谓的欣喜和激动。农村人嘛，没有那么多礼节和客套。我站在麻将桌旁递了一根烟给他，他居然说不会抽，这是我非常诧异的，要知道抽烟几十年的我，最初就是从他那里学会抽烟的。

知道人家正热火朝天打麻将，不便打扰，摆了几句龙门阵后，我说抽空找时间咱们再聊，就走了。他实际比我大 4 岁，也是那次见面时才知道的。

我们两家离得不远，中间只隔了一户人家。他兄妹 5 人，上面一个哥哥下面三个妹妹，其中有个妹妹是和我从小学到初中的同班同学。我年龄小，起初人家是不愿意搭理我的，但他妹妹和我是同学，我就经常去他家，一来二去，就和他们玩到了一起。

记得我第一次去县城，是一年暑假和他一起去的，那天我带着私下里积攒了很久，层层包裹在手绢里的 5 块 5 毛钱，那感觉真的如大款一般，路上还不时地摸摸鼓鼓的手绢。到了县城，在县师范校旁的电影院看了电影《少林寺弟子》，还买了一本书，我已记不得书名了，那是我第一次进电影院，也是第一次看到了宽银幕的武打电影。

看完电影，我们一起吃的抄手，第一次吃薄薄的滑滑的还有肉馅的抄手，感觉好吃得不得了。在县城大街上还看到了好多我没见过的水果，黄贵才也叫不出水果的名字。想买来尝尝，又不知道该怎么说，怕丢人。多年后我才醒悟，在不知道那种东西叫什么名字的时候，如果想买又怕叫不出东西的名字而丢人，就可以指着那种东西对商家说：“你这个，怎么卖的啊”？

黄家坝到县城单程 25 里路，我们两个是走路去走路回的。那次我们看了电影、买了书、吃了饭，身上的 5 块 5 毛钱居然还没有花完。那时就觉得县城真好，有柏油路，有高楼，有书店、有电影院、有饭店。以至于以后每次从县城回黄家坝，只要走到那个地名叫白泥湾的地方，我都会不舍地回头望望，望望那即将消失在眼睛里的高楼和宽阔的柏油路。

看了武打电影后，黄贵才就开始带着我练武术了。他在自己屋子的走廊上，吊了一个沙袋，每天都会练上一阵拳击，我们还经常到东风河大堤下的草地上练武，他还买来《武林》杂志，照着上面的讲解一招一式地练。也是他带我慢慢学会了诸如“倒挂金钩”、“鲤鱼打挺”等基本的武术动作。

黄家坝每年夏天都会发一次大水，只要一发大水，东风河里的水就会把那片低洼的稻田淹没，每当大水消退，黄贵才就会带着我拎着竹筐，提着水桶，在稻田的缺口处接鱼，有时一接就是一天甚至半宿。如果很长时间接不到鱼，我们就会挽起裤腿，下到稻田里把鱼往缺口处赶，这时竹筐里不仅有鱼，还会有泥鳅、黄鳝、螃蟹等，当然也会有螺丝、蚂蟥混在其中。累了我们就找个树荫，躺在草地上，看蓝天白云，有时还会去稻田旁边的玉米地折上一根甜玉米杆来嚼。每次接鱼父母都很担心，担心我们贪玩，不小心被大水给冲走，为此我们没有少挨父母的训斥。

由于喜欢和他在一起玩耍，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晚都要去他那里住，为这事，还惹得父母很不高兴，好像我是一个没有家的野孩子，一到晚上睡觉就不见人了，父亲还在半夜扯着嗓门大声地喊过我，让我回家，那回

声曾在黃家坝寂静的夜里久久回荡。

现在还记得黃贵才那间常年黑暗、潮湿的屋子。那时我读上小学，他上初中，我们在一起通常是先写作业，然后再躺在床上摆龙门阵，我记得他的字写得很好，是那种一笔一画方正的楷体。写字就像做人，要堂堂正正大大方方，最初就是他告诉我的。

学抽烟是在黃贵才初中毕业后的一年冬天，他跟随村上那些匠人外出给人家垒墙盖房子，因为是干力活，雇主每天除了管饭还会给一包香烟。他就把香烟整齐地堆在屋里的桌子上，记得那些烟叫“兰花”“飞雁”“红芙蓉”，每包也就两三毛钱。晚上我在他那里写完作业，就和他打开香烟，抽着玩，先是学着从鼻孔里冒烟，接着就是把烟雾往肚子里吞，尽管呛得泪流满，还是慢慢地上了瘾。

黃贵才的学习本来还算可以，初中毕业后没考高中，想复读一年，能考个中专学校直接分配工作吃商品粮，后来因为家里兄妹多，拿不出九块多钱的报名和考试费，就没有再读书了。这次见面，他和我讲起这事还满是委屈，说当年如果考上了中专，自己的一生肯定不是现在这样。

他不读书后，没多久，就有好心人给他介绍了女朋友，因为他人实在，又有一把力气，恋爱了不长时间，还没到结婚年龄就成了家。自从他结婚后，我开始离家读高中住校了，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接着我当兵，走得也更远了。

关于他以后的消息，多数都是从父母和兄弟那里听来的。他婚后不久，就带着家人到了汕头打工，做过搬运，烧过锅炉等苦活累活。母亲说，有一次他从汕头回黃家坝，还专门买了很多糖分给邻居们吃，他的手又黑又粗满是老茧。他在汕头呆了近二十年，期间我通过他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同班同学，打听过他的具体情况，还看见过他的照片。本来说好，我在部队利用出差等时机，去看望他的，后来一直未成行。

两年前，他因为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如以前了，他就带着家人回到黃家坝，在县城附近找了一份不需要太重体力的工作。

今年春节，我们终于见上了面，他还是那个个子不高，看上去身材健壮，实实在在，没有坏心眼的黃贵才。只是我们已经陌生了很久，在他打麻将的空隙，我们单独摆了近一个小时的龙门阵，除了聊聊当年那些往事，再没有



了其它话题。他还告诉我，他早已做了爷爷，在县城为孩子买了房，现在已经没什么操心事了，除了力所能及地干点活之外，业余时间就喜欢打麻将娱乐娱乐。

我送了他从外地带回去的酒，谁知第二天，他又给了我一袋自家腌制的香肠腊肉，说在远方很难吃到正宗的，这是老家特有的风味，让我不要嫌弃，是他的一份心意。

假期结束，快要离开故乡的那些天，我漫步在黄家坝的丘陵山野，看见满山枯黄的小草，在当年我们玩耍过、淘气过的山坡上不停地摇曳，触景生情，突然所悟，其实我们的一生也正如这些漫山遍野的小草，平凡而普通、短暂而静默……

再读首诗吧：

草名考

老家黄家坝山上好多的草

我嘴一张都还叫得出名字：狗尾草、车前草、丝茅草、胖儿草、芨芨草……

年头好，绿油油的一片茂盛，年头坏，病恹恹的毫无生机

发芽、成长、结籽、变老。寒来暑往，一年又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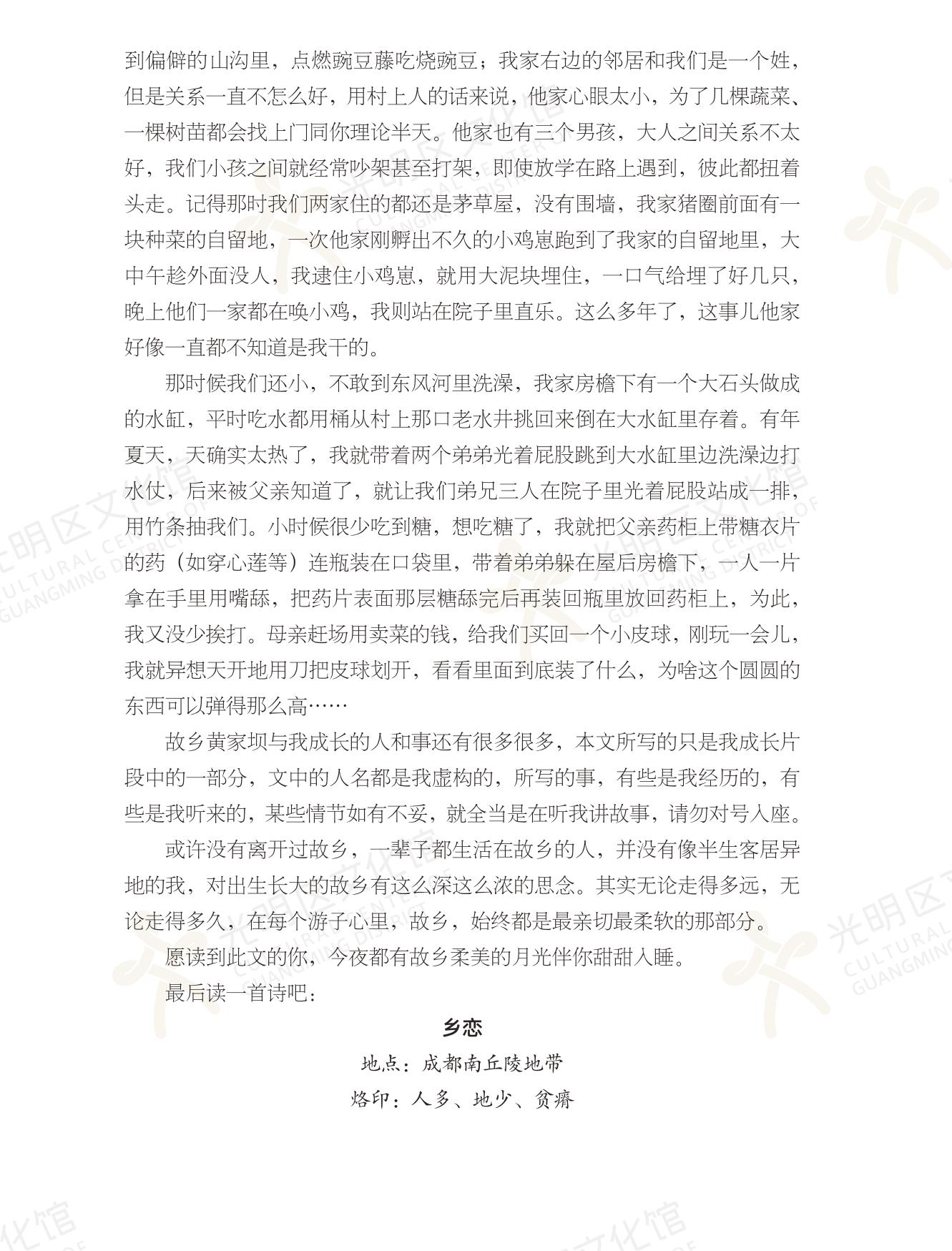
就像和我一起长大的发小：朱四娃、谭老六、王二仙、周九斤、张三锁……

他们都有一个像草一样的名字，还有如草一样的一生

包括我，离开黄家坝多年的，刘六佑

后记

其实故乡黄家坝留给我印象还有很多，诸如我家左侧邻居的兄弟俩，一个比我年长几岁，一个比我小两岁，我们都是一起长大的发小。按村里的辈分，他们长我一辈，我分别叫黄三爸和黄五爸。尽管他们姓黄，我姓刘，但是两家关系一直很好，谁家有事忙不过来都会很热情地相互帮忙，那时各家经济条件都不太好，我们两家曾各出一半钱，合伙买过一台木制的风簸箕（清理稻谷、小麦、菜籽中杂物用的农具），两家共同使用。有一次黄三爸趁家里没人，爬上风簸箕从墙上取下一块熏黑的腊肉，洗都没洗就切成块儿放锅里炒，炒得焦黑冒油就以为全熟了，我们啃着半生不熟硬邦邦的腊肉，满嘴又黑又腻；我们弟兄三人经常带着黄五爸，漫山遍野地去扯人家地里成熟了的豌豆，跑



到偏僻的山沟里，点燃豌豆藤吃烧豌豆；我家右边的邻居和我们是一个姓，但是关系一直不怎么好，用村上人的话来说，他家心眼太小，为了几棵蔬菜、一棵树苗都会找上门同你理论半天。他家也有三个男孩，大人之间关系不太好，我们小孩之间就经常吵架甚至打架，即使放学在路上遇到，彼此都扭着头走。记得那时我们两家住的都还是茅草屋，没有围墙，我家猪圈前面有一块种菜的自留地，一次他家刚孵出不久的小鸡崽跑到了我家的自留地里，大中午趁外面没人，我逮住小鸡崽，就用大泥块埋住，一口气给埋了好几只，晚上他们一家都在唤小鸡，我则站在院子里直乐。这么多年了，这事儿他家好像一直都不知道是我干的。

那时候我们还小，不敢到东风河里洗澡，我家房檐下有一个大石头做成的水缸，平时吃水都用桶从村上那口老水井挑回来倒在大水缸里存着。有年夏天，天确实太热了，我就带着两个弟弟光着屁股跳到大水缸里边洗澡边打水仗，后来被父亲知道了，就让我们弟兄三人在院子里光着屁股站成一排，用竹条抽我们。小时候很少吃到糖，想吃糖了，我就把父亲药柜上带糖衣片的药（如穿心莲等）连瓶装在口袋里，带着弟弟躲在屋后房檐下，一人一片拿在手里用嘴舔，把药片表面那层糖舔完后再装回瓶里放回药柜上，为此，我又没少挨打。母亲赶场用卖菜的钱，给我们买回一个小皮球，刚玩一会儿，我就异想天开地用刀把皮球划开，看看里面到底装了什么，为啥这个圆圆的东西可以弹得那么高……

故乡黄家坝与我成长的人和事还有很多很多，本文所写的只是我成长片段中的一部分，文中的人名都是我虚构的，所写的事，有些是我经历的，有些是我听来的，某些情节如有不妥，就全当是在听我讲故事，请勿对号入座。

或许没有离开过故乡，一辈子都生活在故乡的人，并没有像半生客居异地的我，对生长大的故乡有这么深这么浓的思念。其实无论走得远，无论走得久，在每个游子心里，故乡，始终都是最亲切最柔软的那部分。

愿读到此文的你，今夜都有故乡柔美的月光伴你甜甜入睡。

最后读一首诗吧：

乡恋

地点：成都南丘陵地带

烙印：人多、地少、贫瘠

名字：黄家坝

碰触一个烙印，心就扎痛一次
提及一次名字，就像讲起娘亲
丑。您却一直甜着梦
远。魂，也要回您怀中

